

迈向 2035 年： 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经济展望*

夏杰长 刘 诚

摘要：2021—2035 年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期，是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实施“两步走”战略的关键时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且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发展环境变革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本文在深刻剖析世界经济变局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合理推论，提出了迈向 2035 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发展十大趋势，包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制造”质量显著提升、服务业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等。

关键词：2035 年 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经济展望 现代化

作者简介：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刘 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1—2035 年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期。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发展环境变革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充分研判这一时期世界发展环境、发展格局和可能的变局，对研判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021—2035：变化中的世界

（一）世界经济在不确定中增长

1. 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综合考虑技术、城镇化、人口、环境等重大基础因素变化，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呈现趋势性下降，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可能会保持较低的增速。2021—2035 年，全球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 3% 左右。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将可能进一步放缓，整体增长速度大约在 2% 左右，要低于过去 50 多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年均增长速度在 5% 左右。城镇化仍将是部分发展中国家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到 2035 年，全球的城镇化率将达到 62%。到 2035 年，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应急项目《“两步走”战略背景下服务业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与实施路径研究》（2021CJY03003）的研究成果。

接近 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继续从欧美转移到亚洲，亚洲经济体量超过欧美之和。

2. 人口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亚洲、北美、欧洲等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出生率都将低迷，成为限制经济增速的主要经济因素。非洲、中东等地区有望成为世界人口主要增长点。

3. 中国成为全球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稳定力量。未来中国的经济地位更加重要，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并且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中美成为全球两个超级大国。未来 15 年，中国作为一个“巨型国家”的快速复兴和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衰落，以及约瑟夫·熊彼特所谓的“科学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等因素相互交织、重叠、渗透，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为中国发展增加变数，中国则为世界发展提供持久稳定力量（陈文玲，2019）。

（二）中美平行发展共同主导世界经济秩序

1. 中美是平行发展的合作伙伴。传统政治理论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即修昔底德陷阱。正因为此，2021—2035 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等收入陷阱”“债务陷阱”等诋毁中国的论调仍将此起彼伏，争论的核心将是中美之争（曾培炎，2021）。

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央，是全球大变局的主要内容。但仍需承认，2021—2035 年，尽管美国的整体竞争优势相对下降，但凭借强大的金融优势、科技优势，其经济增长速度在发达国家中仍将位居前列。中美在产业和科技等方面各有侧重，中国消费和数字经济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但高端制造、核心技术、金融服务、跨境商务服务仍落后于美国。

2. 中美在部分领域成为激烈碰撞的竞争对手。当然，不排除在短期内或部分领域内的中美激烈碰撞，比如科技和金融领域，两国较多表现出竞争对手的一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产业链和供应链问题。美国将与盟友合作，打造“去中国化”的技术产业链，建设更强大、更具弹性的自主供应链。

（三）欧洲处于稳态，欧盟内外困境较多

1. 欧洲经济发展处于稳态。欧洲长期形成的科技、制造、医疗、教育等全球优势，将在未来十几年继续保持，而且在全球产业链收缩、国家安全考量加重等背景下，欧洲上述优势可能更加凸显。但由于在数字经济方面相对于美国和中国没有多少优势，所以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未来十几年，欧洲经济增长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张旭东，2020）。预测到 2035 年，欧洲经济处于 2% 左右增速的稳态，与通胀率相当。疲弱的经济导致欧盟仍实行负利率，英国也将保持较低利率水平。而且，英国在脱欧后受全球经济影响进一步下滑。由于劳动力不足和高学历人才较多，2021—2035 年期间欧洲失业率不高，高端人才不是很缺，但护工等少数工种的中低端人才缺口大。

2. 欧盟内外困境较多。欧盟内部纷争不断，一体化难有大进展。欧盟是一个大集体，也设有一套官僚机构、司法和行政体系，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问题在于只有将部分国家主权让渡于欧盟才可以让欧盟更加强大，但欧盟的强大却削弱了国家权力。正因此，法国提出的很多改革出于法国利益，会遭到德国反对，反之亦然。而法国、德国之外的小国，为了领取欧盟赋予的财政补贴，不得不听命于两国的安排，但在一些预算和司法问题上也会公然违背欧盟的旨意。需要关注的是，欧盟能够在国际上行使经济权力的主要领域有两个：首先是与保护个人资料、版权、消费者权益、食品、健康和环境有关的全球标准，在这方面，欧盟可以行使所谓的“规范性权力”；其次是产业政策，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领域，欧洲可凭借技术、市场和规则优势，打造与中美相抗衡的产业体系。

（四）发展中国家分化，部分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1. 亚洲群体性崛起。亚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近年来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 50%。毋庸置疑，亚洲将继续是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莫莉，2021）。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亚洲国家出台了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新举措，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治理以及国际数字合作等多个方面，数字经济在推进复工复产、稳定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望成为推动亚洲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动力。

东盟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在亚洲率先崛起。由于东盟政局稳定、人口红利显著、一体化程度提高和区位优势等原因，未来 15 年东盟将会进一步维持中高速增长。其中，越南有望承接中国制造的产业转移，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且越南这几年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夏杰长、姚战琪、徐紫嫣，2021）。当然，相比中国，越南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市场规模较小、劳动力人口基数较低、教育和高技能人才短缺，因此其发展潜力不能高估。

印度将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年轻劳动力比重高，政府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印度经济将会持续中高增长。从截至 2020 年的数据来看，印度经济发展具有几大优势：一是航运业。全球 170 万名船员中，超过 20 万人来自印度，许多人更是担任了高级船员及需要重要技能的职务。二是仿制药。印度是全球最大仿制药供应国，美国所有处方药中有 90% 是仿制药，其中 1/3 由印度生产（朱萍，2019）。三是仅次于中国的服装鞋帽出口国。四是欧美财经行业的后勤支持。印度是全球最大信息业务外包承揽国，是欧美许多大银行及会计公司的人才和后台服务的主要供应国。当然，鉴于印度的制造业能力、政府管理水平、社会结构和基础设施太差，增长潜力不宜高估，到 2035 年其与中国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非缩小。例如，2021 年 4 月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非常严重，大量从中国等地进口医疗防护物资，而且印度各行业大量外资订单被取消并迁入中国企业生产，这暴露出印度制造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和政府管理水平低下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制造业水平不足，除其无力应对大流行病等外生冲击之外，还与该国营商环境薄弱有关。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统计，印度依然是全球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宋林霖、张培敏，2021）。从总体上来看，印度靠自己的能力是无法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如果在美国和欧盟的推动下，持续将产业链迁出中国，通过“印度 + 一众中型国家”的方式，还是有可能危及到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的，有望接替中国成为最大发展中经济体。

2. 部分金砖失色。21 世纪的前 10 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的成就是极为辉煌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然而，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虽高于欧美国家，但目前总体处于下滑通道（邱涛，2021）。2021—2035 年，中国、印度经济增速趋缓，由中高速转向中速，增长率约在 5% 左右；俄罗斯、巴西、南非三个金砖国家则处于 3% 左右的低速增长态势，个别年份还将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负增长。其中，俄罗斯的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到 2035 年，随着新能源革命以及能源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分量的下滑，俄罗斯经济实体有可能进一步萎缩。

3.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未达到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预测到 2035 年，除中国外的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么达不到中等收入阶段，要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①只有中国能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性，一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往往会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和挑战，甚至出现了国民收入长期停滞、不再继续增长的情况，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五）全球科技分化且标准提升

1. 中美引领全球科技分化。中美两国都在强化全球科技主导力量，不仅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具有公共科学技术知识领域，而且在包括企业开发试验研究、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研究领域都将加强安全防范措施。2021 年美国拜登签署的一项供应链审查方面的行政命令列出了 4 种产品和 6 大领域，或将成为未来中美科技分化的主要产品和领域，具体包括：半导体芯片、电动车电池、稀土和药物四种产品，以及国防、公共卫生、通信技术、运输、能源和食品生产六大领域。中美两国政府和相互竞争的公司之间多年来进行着控制数字经济标准和技术的斗争，贸易战使这一斗争大幅升级，这场斗争的战线从建立市场主导地位，延伸到制定行业标准，再到监管体系。美国政府如果拒绝接受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扮演“建设性角色”的做法，可能会促使中国支持一个有着截然不同规则的平行或独立体系。如果中美两国均试图组建排他的技术阵营，或将使全球企业进入一个分化的市场，这对国际市场和经贸结构的影响有时是致命的。预计 2021—2035 年，中美产业脱钩继续向技术脱钩纵深发展。

2. 科技伦理等标准成形。科技标准不仅限于技术本身，逐步向法律和伦理道德延伸。2021 年 4 月 21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人工智能监管草案，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进行了风险评定。根据这份草案，欧盟将全面禁止大规模监控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信用体系，同时对特定领域的“高风险”应用进行严格限制（程莹、崔赫，2021）。

（六）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发展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领域，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点。第一，5G 和 6G 技术、云计算与关键设备。技术、计算能力和设备是产业链稳健发展的最底层的支撑力量，成为各国数字经济投资合作的重中之重。第二，工业互联网。数字技术正逐渐渗透到制造业领域，并推动工业技术进步。到 2035 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基本普及，工业企业基于平台进行研发、设计和生产，工业平台成为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大型制造企业争夺的焦点，就像现在争夺电商市场一样。工业互联网可以被看作是数据、硬件、软件和智能的流通与互动。工业互联网的机器学习能力，强调人的智慧与机器的智能之间的互动和辅助关系，而非替代性。第三，芯片生产。芯片是制约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同问题。2020 年底，德国、法国以及其他 11 个欧洲国家宣布签署一项“欧洲电子芯片和半导体产业联盟计划”，以打破美国对芯片领域的主导，计划到 2030 年，欧洲生产的尖端、可持续半导体（包括处理器）至少占全球总产值的 20%，并在 5 年内制造出首台量子计算机。^① 预计到 2035 年，中美欧成为芯片主要研发和生产国家或地区；其中，中国生产的芯片仍处于相对低端的位置，但总量可以满足国内基本需求。

（七）全球碳达峰、欧美逐渐走向碳中和

1. 碳达峰国家数量持续增多。2015 年，国际社会达成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温控长期目标，即在 21 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 2℃ 以内，并努力控制在 1.5℃ 以内。众多研究表明，国际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 21 世纪下半叶甚至 21 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王真、邓梁春，2016）。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截至 2020 年底，全球已经有 54 个

^①陈书玉：《1.5 万亿芯片巨头出手斥资 1300 亿建厂，热钱涌入半导体板块“缺芯潮”将持续多久？》，东方财富网，2021 年 7 月 11 日。

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40%。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碳排放达峰国家的数量分别为 18、31、50 和 54 个，其中大部分属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占当时全球碳排放量的比例分别为 21%、18%、36% 和 40%。2020 年，排名前 15 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 2030 年以前实现达峰。届时全球将有 58 个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占全球碳排放量的 60%（苏小环，2021）。

2. 欧美引领碳中和之路。美国和欧盟一向重视气候变化议题，这也是欧美的优先事项，二者都计划 2050 年实现气候中立（或者说净零排放、碳中和），即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乐观预测结果是，欧美可以如期达成相应计划。为实现碳中和，2021 年欧盟 27 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同意到 2030 年，其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将从此前设立的目标——比 1990 年的水平减排 40%，提升到至少 55%。与此同时，欧盟加快新能源汽车及配套装置建设。欧盟计划到 2030 年，欧盟电动车市场占有率达 35%~40%（周武英，2021）。此外，还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鼓励汽车制造商将资源转向清洁汽车，希望到 2030 年零排放汽车数量达到 3000 万辆。欧盟要实现电动汽车梦想需要大量投资，仅充电桩一项就需投资约 800 亿欧元，需新建约 300 万个充电桩（驻欧盟使团经商参处，2020）。

3. 2035 年前后全球碳达峰。2030—2035 年，中国逐渐步入碳中和之路，欧美碳中和路径则走得更加深入，同时有更多国家碳达峰，在这些积极力量的作用下，全球走向碳达峰。这将深刻改变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格局，并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冲击最大的是俄罗斯、中东、非洲等依靠化石能源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国际政治格局的地位将有所下降。

（八）产业链重构更加频繁

1.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调整。由于技术进步加快、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不确定增加，各国和地区基于安全考虑加速重构产业链。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促使产业链重构。过去 20 年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主要是基于生产成本的“雁阵式”转移，即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成本，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制造品的可贸易性，使得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梯度转移（纪玉俊、尹晓婧，2020）。由于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对传统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高效的通用软件平台对专用性重资产的大规模替代，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使得传统的生产要素对产业区位的影响力下降，无人化、智能化工厂的快速发展有可能促进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制造业在发达工业国家的本地化生产，甚至有可能随着新型生产制造范式效率的提高，出现传统制造业向发达工业国家回溯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由于发达市场经济体拥有更高收入的群体和更加挑剔的领先用户等市场需求侧的优势，也会遏制甚至反转全球产业“雁阵式”梯度转移趋势。

2. 供应链安全问题促使产业链变动。各国政府和依赖国际供应的企业均认识到外部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安全风险，供应链安全将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考虑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因素。安全因素将引起产业链和供应链朝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更加自给自足的供应。各国政府和企业均可能将供应链更多地集中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是更加多元化的供应。对于无法自给自足的供应，各国政府和企业可能有意识地寻求可代替的多个供应来源地，防范单个供应来源中断带来的风险。三是更加伙伴化的供应。部分国家质检可能组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合作伙伴，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关系，为国际化的供应链提供更好的政治安全保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新的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或者

双边协定，有利于在区域或者双边层面发展跨国供应链。上述三个发展方向表明，考虑安全因素后，全球供应链中会有一些部分向国家内部集中，但不会所有的全球供应链均成为国内供应链。全球供应链会因多元化和伙伴化供应关系的建立，继续在国际上扩张。越是紧张的国际环境，全球价值链越可能朝着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越是宽松缓和的国际环境，全球价值链越可能朝着多元化和伙伴化的方向发展。

（九）数字货币冲击美元霸权

1. 美元仍是最主要国际货币。到 2035 年，全球的货币金融系统仍将严重依赖美元的国际流动性。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目前通行的国际结算系统环球银行电信协会（SWIFT）成了美国的“一杆枪”。美国制裁谁，SWIFT 就跟着制裁谁，否则美国就冻结美元交易，并对 SWIFT 董事会成员进行制裁。这些措施包括冻结个人资产和对他们发布美国旅行禁令，以及限制相关银行在美国开展业务等。

2. 其他货币和支付系统难成气候。其他支付体系只限国家或地区间的特定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活动。2019 年起，欧洲方面已开始探索创建独立于美国的全球支付系统，英国、法国和德国创建了一个新的支付系统“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允许欧洲企业在不违反美国制裁的情况下与伊朗开展贸易，可以用来保持欧洲企业与伊朗之间的一些贸易线路畅通，挽救伊核协议。然而，该支付系统只具有象征意义，实际仅用于食品、药品和必需消费品等人道主义物资供应。预测到 2035 年，该支付系统仍将存在并可能扩大到欧洲与伊朗之外的其他国家，但仍限于被美国制裁的特定地区的特定商品或服务。而且，到 2035 年中俄等国家之间也可能建立一套支付系统，也将限于石油等特定商品或服务。

3. 能挑战美元霸权地位的很可能是数字货币。数字货币，也称加密货币，不依托任何实物，是使用复杂的密码算法与计算机技术创建、分发和维持的一种货币。数字货币对全球治理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一是削弱一国的“货币主权”，影响货币政策效果。数字货币发行者通常是科技公司，货币被创造于银行体系之外，这将削弱货币政策传导和执行的有效性。二是加剧金融系统波动风险。数字货币发行量主要取决于发行者的意愿，将使货币供应量不稳定，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数字货币本身的价值亦具有较大波动性，可能引发以数字货币定价和交易的股票、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动荡。三是可能被用于洗钱、资助恐怖分子等犯罪活动，国际社会对此仍存在担忧。由于数字货币的第一个特性，也即可在无国界的条件下削弱主权，故很可能成为制约美元霸权的利器。

（十）全球经贸呈现区域化发展趋势

1. 全球化可能被逆转，走向本地化和区域化。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运输成本下降、技术进步为贸易铺平道路，这是促使自由贸易的客观规律。但是，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对产业安全性、稳定性要求提升，导致了产业链倾向于本土化和区域化，一些跨国公司将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转向本国或本地区（盛朝迅，2021）。

2021—2035 年，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断是，未来国际交流将不会消亡，但它很可能变得更加区域化和虚拟化，贸易增速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超过全球产出增速，而是与全球产出增速大致保持一致。与此同时，自由贸易将在更多国家和地区遭遇更多人群的抵制，国家和地区之间签署的区域性贸易协定大幅减少，结束了之前数十年的不断上升趋势。

2. 全球贸易模式转变，更加有利于发达经济体。2021—2035 年，全球化将经历意义深远的结构性转变，使竞争环境向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方向倾斜。这是因为：第一，服务贸易比重提高。尽管商

品贸易已趋平稳，但服务和跨境数据流动已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领域。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贸易处于顺差，并持续扩大，它们处于有利地位，能够抓住娱乐、媒体、云计算、远程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未来增长（刘典，2021）。第二，所有的产业价值链更加依赖于研发和创新。大多数人对全球化的看法停留在离岸外包、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的工厂倒闭这些方面。但如今，劳动力套利游戏似乎即将结束，全球在品牌、软件和运营流程等无形资产上的支出相对于营收将持续扩大，这对拥有高技能劳动力和强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欧洲、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来说是利好的。

二、2021—2035：中国经济展望

本文在深刻剖析世界经济变局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合理推论，提出了 2035 年中国经济十大趋势。这一长期视角的研判，对充分认识短期、中期经济问题，合理设计经济政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

1. 未来仍需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当前，中国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不再是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规模的较快增长与人均 GDP 水平的不断提升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以及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因此，在 2021—2035 年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必须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2. 党中央对经济增速提出了明确要求。党中央对 2035 年中国发展提出了较高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设定了 2035 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到 2035 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关于“十四五规划”说明时表示，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 2035 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可以将 2021—2035 年经济增长目标归结为三条：一是到 2035 年 GDP 比 2020 年翻番；二是人均 GDP 比 2020 年翻番；三是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约为 2.3 万美元）。要达到这三个目标，按低、中、高三个方案测算，2021—2035 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速分别至少达到 4.6%、4.8% 和 5.5%。不论实现哪个增速，可以肯定的是，到 2035 年中国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

3. 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上述三个目标中，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要求最高，实现难度也最大。2021—2035 年，只要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平均保持在 5%~6% 的区间，到 2035 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 35 万亿美元。届时，中国总人口大约 15 亿人，人均 GDP 将达到 2.3 万美元左右，基本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二）产业链实力增强，“中国制造”质量显著提升

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并跻身发达国家的同时，发展模式也从赶超模式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产业链向高端化发展，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强劲。

1. 工业体系更加完备和高端化。到 2035 年，我国维持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在亚洲区域产业分工中的核心地位更加牢固，并呈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良好态势，制造业比重维持在 25%~30%。

2. 重点产业“缺芯少核”状况未发生根本改变，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有向外迁移风险。2021—2035 年，全球保护主义盛行，不断改变全球产业链分工逻辑和地区布局，很多国家把医疗器械等关键产业链的本土化视做核心利益，通过立法、补贴等多种方式，推动关键产业链回流。一些国家开始鼓励本国企业分散化的布局，并提出供应链“去中国化”战略。从国内发展的条件变化看，中国制造业向外转移有加速的趋势。保障产业链安全，预防全产业链外迁和高端产业外迁所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问题需要提高警惕和预防。

3. 中国产业链在全球地位提升，但仍有欠缺。总体判断，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支撑力还停留在“规模发展”，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肖宇、夏杰长、倪红福，2019），而发达国家大多是以品质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作为优势竞争力。到 2035 年，我国产业链更加完备，价值链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5G、云计算和高铁等继续领先，芯片、操作系统等领域攻坚克难，但高端产业链仍不完备，一些软硬件关键技术和设备仍然受制于人，比如电池技术、发动机技术等。数字基建成为主流，高铁等传统基建转向非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但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仍弱于美欧，美国在金融和美元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不变，美国科技强于欧洲，欧洲科技绿色制造和先进制造领先中国。

4. 困扰中国制造最大的难题是劳动力不足、未富先老和过早去工业化。随着制造业工厂的智能化、自动化设备日益完善，企业对知识型、技术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缺乏一线熟练工人和高级技工。但是，中国的学历教育没有办法解决工厂的燃眉之急。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学毕业生都想当白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学教育和现实需要脱节，实用型岗位人才奇缺。这些年，中国一直强调要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但是制造业比例下降、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以及部分外资撤离等因素，都让这个目标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都是在人均 GDP 分别达到 1.7 万、1.9 万和 2 万美元的高收入水准时，制造业比重才开始下降。而中国呢？在 2006 年，中国人均 GDP 是 3069 美元时，制造业比重就开始出现下降。中国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在 2006 年时是 32.5%，到了 2020 年时已经下降到 26.2% 左右，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这个下降速度过快过早，值得警惕，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扭转这个现象。

（三）服务业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服务业发展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趋势。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世界经济逐步向服务业转型，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服务业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形成了“四个 70%”的标准。^①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生产方式以及居民生活范式的转变，服务业比重将继续提高，且将朝着网络化、平台化和智能化方向演进（夏杰长、肖宇、孙盼盼，2020）。

2. 服务业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建成。2021—2035 年，中国服务业比重仍将缓慢上升，更重要的是，服务业技术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服务业现代化体系基本建成。从比重来看，消费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品质化发展，比重有所降低，占 GDP 比重约为 10%；生产性服务业实现高端化、专业化发展，比重不断增加，占 GDP 比重约为 45%；服务业总体占 GDP 比重约为 60%。从增长动力和生产效率来看，服务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夏杰长，2020）。社会各界在谈及“高质量”“高科技”

^①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70% 左右；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各行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 70%；经济增长的 70% 来自服务业增长；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到 70%。

等概念时，往往直接与高端制造业挂钩。但实际上，当我们讨论高端制造业时，很大程度上是在讨论高端服务业，比如知识产权、研发、数字经济等。从产品价值链上看，服务部分所占比重愈来愈大，商品最终价格中服务环节“加价”增加，甚至超过“制造环节”或“农业生产环节”。

3. 进入高标准服务经济时代。2021—2035 年，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中国经济服务化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将趋于收敛，服务业成为稳增长、调结构和稳就业的重要抓手，中国将进入高标准的“服务经济时代”（夏杰长、徐紫嫣，2021）。

（四）国内大市场潜力逐渐释放

中国社会的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能力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国迅速变成“世界超市”，变成其他国家和地区各类商品最大的销售市场。

1. 内需总量和全球占比提高。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扩大内需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当人均 GDP 达到 2 万美元时，发达经济体国内市场出现阶段性转换，均表现出了国内需求为主体的显著特征。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率基本维持在 75% 以上，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率基本维持在 65% 左右。据此推测，2035 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有望突破 200 万亿元。2035 年中国消费市场总量将超过欧美总量之和，成为全球消费主力。与此同时，预测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占世界比重持续攀升，北上广深以及成都、哈尔滨、青岛等国际、国内和地区消费中心遍地开花。

2. 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明显。一是网络消费成为主流。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网络制度不断完善，未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相连的新一代互联网将形成，这为中国网络消费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基础。未来网络消费将不仅局限于网络购物，而且将向网络服务、虚拟消费、智能消费等更加广阔的领域延伸（张颖熙、徐紫嫣，2021）。二是绿色消费诉求日益强化。中长期内，住行在中国仍将作为主导消费领域，绿色住宅、新能源汽车将成为居民未来住行升级的主要方向；消费者健康意识提高，环保知识增长，空气净化器、环保家具、节能冰箱等绿色概念的家电、家具等产品消费逐步被认可并受到青睐；绿色发展观更加鲜明，绿色、健康、有机的食品、饮用水、空气等越来越受到居民的重视（刘慧、夏杰长，2021）。三是农村消费市场空间扩大。农村消费将沿袭城市消费升级发展路径，进入消费发展新阶段。四是养老消费占据主导。伴随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银色经济时代即将来临，部分耐用消费品增长趋于饱和，消费重心向以中老年为主导的领域转移，高层次、高质量、个性化、多元化的养老消费、银发产品与服务消费将逐步占据消费市场。

3. 国内市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区域市场割据和壁垒基本消除。中国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市场主体平稳运转，市场需求逐步改善，市场环境日趋完善。出台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有关部门多措并举，全方位减税降费，为市场主体回暖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市场活力不断提升。2035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有望跻身前 10 位，营商环境成为中国新名片。

（五）服务贸易引领对外开放

1. 服务贸易和投资体量大幅攀升。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贸易方式变革，服务贸易地位将不断攀升，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将成为推动对外开放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王晓红，2021）。到 2035 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将超过货物进出口总额；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

测及治理服务等高技术服务业吸引外资能力较高，占服务业 FDI 比重将超过 50%。

2.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为代表的各类先行先试对外开放试验区域，在关税税率、通关效率和出入境限制等方面，逐步达到发达经济体自由开放的水平（刘诚，2021）。

（六）全面实现绿色发展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告，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宣布努力于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不仅与《巴黎协定》提出的温升控制目标相一致，并且与中国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美丽中国的目标相契合。

1. 非化石能源将从配角转变为主角，化石能源最大限度被淘汰。2016 年 12 月 2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提出，到 2030 年和 2050 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分别要达到 20% 和 50%，新增能源需求主要依靠清洁能源满足。可再生能源价格优势初现端倪，未来价格优势将更加明显。

2. 电气化进程加快，终端部门电气化是关键所在。2020 年 5 月 1 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电气化发展报告 2019》，从电力供应、电力消费、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 15 项指标评价电气化进程，发现中国电气化仍处于中期中级阶段，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因此，为逐步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预计 2021—2035 年，中国势必加快工业、交通、建筑等能源消费终端部门的电气化进程。

3. 工业结构呈现绿色化发展趋势，低碳新工业体系基本形成。未来，中国重化工业仍将存在，但是“高碳”重化工业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随着中国工业结构绿色化发展和工业用能清洁低碳化发展，工业生产过程碳减排重要性凸显，低碳新工业体系逐渐建立。

4. 加快普及绿色智能交通，交通运输模式创新展示巨大发展潜力。未来，电动汽车、智能交通、共享交通、自动驾驶等交通方式在碳中和愿景下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且这期间伴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助推了交通运输方式的革命。预计 2021—2035 年，中国部分地区将采取试点征收拥堵税、大排量税、燃油税，禁售燃油车等举措。

（七）中国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追赶国家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实现赶超。美德在 20 世纪初对英国的超越，日韩在二战后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都是依靠技术创新提升钢铁、飞机、汽车、电子等当时前沿行业生产率。中国当前面临数字革命机遇的同时，也遭遇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科技封锁等外部挑战，“以市场换技术”模式难以为继，故需更加强调内循环和自主创新（林垚，2021）。可预见到 2035 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将位居世界第一，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会居于世界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技术创新大国。

（八）共同富裕之路迈上新台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使命。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旗帜鲜明地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当然，共同富裕有先有后，全国整齐划一进入共同富裕暂时还难以实现。以社会主义先行区、

共同富裕区为代表的地区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中级或高级阶段，有条件的地区逐渐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带动全国逐渐向共同富裕迈进是大势所趋。到 2035 年，中国有望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刘诚、夏杰长，2021）。

（九）人口峰值回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1. 中国人口数量在 2026 年至 2030 年之间达到一个“转折点”，将趋于稳定，甚至出现下降。2021 年 5 月公布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增长了 5.38%，达到 14.1 亿，这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最慢的人口增长率。近年来，由于生活成本的上升和社会习俗的改变，生育率有所下降（陈卫、刘金菊，2021）。并且由于年轻人和工作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预计在 2025 年之后人口数量趋稳，甚至有可能稳中有降。

2. 劳动力受人工智能冲击严重。麦肯锡对中国 2030 年劳动技能和职业进行了预测，到 2030 年多达 2.2 亿中国工人可能需要在职业之间转换（下岗和再就业），约占劳动力总数的 30%，其中对体力、基本认知技能的劳动需求将分别下降 18% 和 11%（Woetzel 等，2021）。

3.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生活更加美好。到 2035 年，中国将形成与发达国家总人口规模不相上下的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获得重大进展，中国社会在现代性意义上的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

（十）人工智能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1. 制造业将是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最为丰富、最具潜力的领域。2021—2035 年，对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求贯穿制造业全生命周期，成为未来人工智能融合应用的关键领域。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将在制造业更多环节、更多层面得到推广和深化。

2. 各大科技企业扎根场景深挖落地应用，使得人工智能产品真正“有用”。新零售、无人驾驶、医疗和教育等易落地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将更加受到资本关注。预计 2021—2035 年，围绕算法、数据和算力等人工智能新基建的“三驾马车”，人工智能产业链建设力度将继续增大。

3. 各地政府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热度持续。地方扶持政策、举措等也将变得更加务实和具备可操作性，应用将成为政府关注和紧抓的重要内容。国内更多城市（群）将聚焦智能芯片、智能无人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优势产业，面向医疗健康、金融、供应链交通、制造、家居、轨道交通等重点应用领域，积极构建符合本地优势和发展特点的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场景。预计到 2035 年数字税将成为中国重要税种之一。

4. 到 2035 年中国人工智能仍落后于美国。伴随人工智能发展对算力需求的不断迭代升级，到 2035 年中国人工智能芯片企业仍大量依赖高通、英伟达、AMD 等国际巨头提供符合要求的芯片产品，国内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发展与国际巨头相比属于仍在探索期。而且，到 2035 年中国在数字经济细分应用领域的专业人才缺口仍较大，这在当前少儿计算机教育数据中可见一斑。2020 年，少儿编程教育在美国的渗透率达到 44.8%，在中国仅为 0.96%，差距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 曾培炎：《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正确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全球化》，2021 年第 2 期。
2. 陈文玲：《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化》，2019 年第 5 期。
3. 张旭东：《脱欧后的英国与欧盟都将面临艰巨考验》，《今日中国》，2020 年第 3 期。

4. 莫莉:《亚洲经济具备持续增长动力》,《金融时报》,2021年7月14日。
5. 夏杰长、姚战琪、徐紫嫣:《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6期。
6. 朱萍:《印度药企“兵临城下” 中国仿制药机遇何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11月18日。
7. 宋霖霖、张培敏:《以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路径选择——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学术界》,2020年第5期。
8. 邱涛:《金砖国家制造业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第4期。
9. 程莹、崔赫:《欧盟高风险人工智能监管的五个特点——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草案)初步解读》,《互联网天地》,2021年第6期。
10. 王真、邓梁春:《巴黎气候会议对全球长期目标的新发展》,《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6年第2期。
11. 苏小环:《走进碳达峰碳中和 碳达峰——世界各国在行动》,澎湃网,2021年1月19日。
12. 周武英:《欧盟实现“碳中和”的路与坎》,《经济参考报》,2021年1月27日。
13. 驻欧盟使团经商参处:《欧盟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需大幅增加》,中国商务部网站,2020年2月7日。
14. 纪玉俊、尹晓婧:《交易成本、地区比较优势与大国雁阵式产业集聚》,《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15. 盛朝迅:《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思路与策略》,《改革》,2021年第2期。
16. 刘典:《全球数字贸易的格局演进、发展趋势与中国应对——基于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视角》,《学术论坛》,2021年第1期。
17. 肖宇、夏杰长、倪红福:《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
18. 夏杰长、肖宇、孙盼盼:《以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理论逻辑与政策思路》,《国际贸易》,2020年第6期。
19. 夏杰长:《迈向“十四五”的中国服务业:趋势预判、关键突破与政策思路》,《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0. 夏杰长、徐紫嫣:《迈向2035年的中国服务业:前景、战略定位与推进策略》,《China Economist》,2021年第1期。
21. 张颖熙、徐紫嫣:《新经济下中国服务消费升级:特征与机制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6期。
22. 刘慧、夏杰长:《加快发展数字家庭 促进居住品质提高》,《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11期。
23. 王晓红:《“十四五”时期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主要思路》,《发展研究》,2021年第5期。
24. 刘诚:《跃居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彰显中国韧性》,《光明日报》,2021年1月28日。
25. 林焱:《“市场换技术”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国物价》,2021年第1期。
26. 陈卫、刘金菊:《近年来中国出生人数下降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21年第3期。
27. 刘诚、夏杰长:《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光明日报》,2021年8月24日。
28. Woetzel J, Seong J, Leung N, et al. Reskilling China: Transforming the World's Largest Workforce into Lifelong Learner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January 12, 2021.

责任编辑:谷岳